

奕訢与戒台寺牡丹院

◎ 国宝档案

戒台寺为北京西山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自唐即已存在，原名“慧聚寺”。寺内的戒坛殿为核心建筑，戒坛创建于辽代咸雍五年（1069年），明代正统年间，兴建戒坛殿，戒坛殿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有中国三大戒坛之首的称谓，因此，戒台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皇家的重视。

戒台寺千佛阁北面，有一座二进的四合院，名为牡丹院，它是戒台寺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园特点兼具北方浅山与江南园林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晚清重臣恭亲王奕訢与这个院落有着深厚的渊源。

奕訢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幼时，皇四子奕宁（后来的咸丰帝）与他同在书房读书。咸丰帝即位后，奕訢被封为恭亲王。

奕訢担任过正红旗族长、宗人府宗令、军机大臣等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逼近北京，奕訢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联军进行谈判，此后他专门负责外交，处理洋务。

1861年，咸丰帝病逝，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即为同治帝。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

没多久，慈禧对奕訢心生猜忌。据史料记载，两宫太后对恭亲王的猜忌始于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任职。”虽然罢免了议政王的职务，但是奕訢“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至此奕訢开始对朝野权力纷争产生厌倦，渴望远离清廷。光绪元年（1875年），因在中法战争中办事不利，“太后谕责王等萎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奉。家居养疾”。为避风雨，奕訢开始遍游名胜古迹，因西山戒台寺离京城较近，且为皇家寺院，奕訢便以养病为由，举家于光绪十年来到戒台寺，移居北宫院。当年康熙、乾隆等皇帝均曾驻蹕北宫院。

奕訢及其家人在戒台寺居住长达十余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恭亲王看到戒台寺的罗汉堂、千佛阁等建筑残破不已，便捐资重修。据《重修万寿寺戒坛碑记》载：“予偶游览至此，何胜钦悚，因其罗汉堂、千佛阁等处，或患剥



落，或将倾圮，捐资修建之。其地有俗称北宫者，亦复其崇隆之旧额，以慧聚堂取存李唐遗意也……”也就是说，在重修戒台寺内的部分殿堂时，他还建了自己在寺内所住的北宫院，他亲笔题额为“慧聚堂”，沿用的就是戒台寺的旧称：慧聚寺。后来因院内广众牡丹花，所以又称“牡丹院”。如今该匾悬挂于戒台寺一小院门额上，落款有“皇六子”和“恭亲王”章。

光绪二十四年，恭亲王因疾薨，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就此陨落。慈禧在懿旨中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

此后，牡丹院历经一百多年风霜雨雪的侵蚀，缺

乏系统的修缮和维护，院内建筑破损严重。为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向世人展示戒台寺在清代的历史沿革、建筑规划等，2015年开始进行修缮保护，恢复这组清代建筑的历史原貌。

因为恭亲王与牡丹院的历史渊源，此次修缮过程中以恭王府花园的结构特点为参照，参考恭亲王于戒台寺留下的诗作，恢复院内景观原貌。这次修缮是戒台寺牡丹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修缮工程。对院内建筑彩绘的修缮保护，是此次修缮工程的重点，也是难点。

相关部门依据设计图纸方案并结合牡丹院中建筑彩绘自身特点，对彩绘的保护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彩绘出现破损的，依据遗存彩绘进行复原，二

是对于彩绘损毁严重，无法确定图案的，按照建筑位置和等级绘制。在绘制过程中使用传统工艺、运用传统材料组织施工。通过上述方法对院内原彩画进行修复，使得非常珍贵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老彩绘得以传承保留。

通过此次修缮，这座清代皇家古建筑恢复了昔日的风貌，成为研究清代建筑及园林的重要实物资料。

牡丹院的一进院由南房、东配房、东南转角房、假山及花坛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二进院由垂花门、北房、东西配房及游廊组成，以南北纵轴对称布置，院落封闭独立。正房两侧耳房处以假山堆砌作为点缀。正房前面，甬道两侧，种植古松树和古丁香树。正房5间

原为奕訢居住之地，东西两厢各有3间配房，是福晋的住处。内院四周游廊环绕，院中牡丹芬芳争艳，雍容华贵。

戒台寺素以奇松闻名，而“卧龙松”为恭亲王所独爱，至今在卧龙松树下仍存有奕訢亲笔题写的卧龙松碑。碑上方篆书：“恭亲王宝”，其下有楷书“卧龙松”三字。

在戒台寺幽静的寺院内典藏着一批工艺精湛、用材珍贵、纹饰华丽的清代古典家具。恭亲王奕訢曾在戒台寺居住过十多年，奕訢和侍从、用人所使用的家具是从恭王府携带而来的。这批古典家具共计77件，至今仍完好地存于戒台寺。其中10件放置于戒坛殿戒坛上的家具属于清代宫廷家具，应是恭亲王奕訢自用家具。现存放于大悲殿中，供游人参观的家具共有67件，一部分是奕訢自己用的宫廷家具，另一部分是供随同的官吏和用人使用的普通家具。

戒台寺现存的与恭亲王有关的文物遗存，是研究清代王府文化的珍贵文化遗产，需妥善保存，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奕訢移居戒台寺期间，参与过的重要事件及行动轨迹尚需深入研究。（据《北京晚报》）

清豫王府留存的石狮

北京城中曾有众多王府，根据史料记载，明代时京城中王府有30座，其中亲王府有19座，郡王府是11座。清代，王府数量逐步增多，至嘉庆年间，王府已达42座，至清末期王府发展到50多座。这些王府经时代变迁，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即使有一些留下来的，也已残缺不全了。

如今，提起王府，很多人会联想起“王府井大街”。这个街名的得来，的确与这里曾经有王府有关。《光绪顺天府志》以及《坊巷志》都提到，这里元代为丁字街，明代在此建十王邸于此，遂称王府街。不过，关于十王邸是十座王邸还是排行第十的王子的府邸，历来有多种说法。民国张次溪的《燕京

访古录》中曾这样记载：“隋朝帅府遗壁座，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北之三条胡同”，“考之系隋朝燕王府北平王罗艺之帅府故址，此壁当系府前之影壁。”也就是说，王府井一带，隋代时就有王府存在。

明代这里是都察院所在，1452年，兵部尚书于谦提出建议，在此设团营，都察院又改为帅府，故此地有帅府园之称。因这一带有王府，且发现有一甜水井，清末时人们称之为“王府井”。

清代，这一带的王府，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豫亲王府。王府最早的主人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爱新觉罗·多铎（1614—1649）。经过几百年的变迁，豫王府现已无存，唯有

卧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牌匾两侧的两个石狮子是原物，其他均无迹可寻。

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从小就深受努尔哈赤宠爱，依努尔哈赤制定的八王议政制度，只有7岁的多铎和9岁的多尔衮，都被立为和硕额真。崇德元年（1636年），多铎被封为豫亲王，掌管礼部事务。多铎与多尔衮为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他也是多尔衮的得力助手，在征战朝鲜、蒙古的诸多战役中，多铎屡立战功。

顺治元年（1644年），多铎封为豫亲王，授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击败李自成。顺治二年，率军攻破扬州，扫除明朝残余势力。这一年，多铎被封为德豫亲王。顺治三年，多铎被任命

为扬威大将军，率军征服了蒙古的苏尼特部。次年，多铎加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

不过，在多铎盛年时，因感染天花，于顺治六年（1649年）不治而亡，时年36岁。多铎死后，他的第二子多尼承袭了豫亲王的封号，不久改为信亲王，豫亲王府也改为信亲王府。

多尔衮死后，多铎被封的爵位亦受牵连，顺治九年（1652年）被降为郡王。当时已继袭亲王爵位的多尼，也因父罪，降为信郡王，多尼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去世。多尼之后，几代均袭信郡王，其中有：鄂扎、洞鄂、德昭、如松等。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恢复了多铎的豫亲王爵位，此后，德昭

的第十五子修龄，由信郡王改为豫亲王，信郡王府又改称豫亲王府，豫亲王的爵位一直延续至清王朝灭亡。

豫王府建筑宏伟，是清朝最大的王府之一。从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到，当时豫亲王府所在地图位置还标的是“信郡王”字样，可见乾隆测绘全图时（全图完工于乾隆十五年），这里还是信王府。

豫亲王府有“小紫禁城”之称，从《乾隆京城全图》也能看出该府的规模，它坐北朝南，一座王府把东单三条胡同隔成了东西两半。王府中轴线上的建筑也有“外朝”与“内廷”格局。前部为正殿银安殿，它面阔5间，进深3间，后部

寝楼各面阔5间。银安殿与后面小殿建于汉白玉须弥座上，气势雄伟。银安殿东西有群房两排，每排13间。后面是“内廷”，院内正中寝殿7间，寝殿设角门直通后罩房。寝殿之东是三座小院，东南还有座院落。

豫亲王的后代们一直延续着清八旗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作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逐步将家底吃空。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其家族已无力支付庞大的开销。1916年，多铎的后代端镇将这座王府，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美国人将这座王府全部拆除，修建了中西合璧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据《北京晚报》）